

列 宁

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

第 六 分 册

人 民 出 版 社

論民族自決權

(摘錄)

八 空想的馬克思與求實的盧森堡⁴⁷

盧森堡說波蘭獨立是一種“空想”，並且再三再四地把這句話重複得令人作嘔，而用譏諷的神情感嘆道：為什麼不提出愛爾蘭獨立的要求來呢？

“求實的”盧森堡，顯然不知道馬克思對於愛爾蘭獨立問題採取了怎樣的態度。這一點值得講一講，以便說明應怎樣用真正馬克思主義觀點而不是用機會主義觀點來分析**具體的**民族獨立要求。

馬克思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慣於用“探牙齒”的辦法來檢查他所認識的那些社會主義者底覺悟性與篤信心。馬克思認識羅巴庭以後，便於一八七〇年七月五日寫信給恩格斯，極力稱贊這位俄國少年社會主義者，但同時補充說：

“……弱點就是**波蘭**問題。羅巴庭對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完全同英國人——例如英國舊派憲章運動家——對於愛爾蘭所說的話一樣”。

馬克思向压迫民族中的社会主义者質問他对被压迫民族的态度怎样,就能立刻发现統治民族(英吉利与俄罗斯)中的社会主义者底一个**共同**缺点:不了解他們对被压迫民族所負的社会主义义务,却一味重复他們从“大国”资产阶级方面接受来的偏見。

在沒有讲到馬克思对于爱尔兰問題的积极主張以前,我們就必须附帶声明一下,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一般民族問題总是采取严格批評的态度,认为这个問題只有相对的历史意义。例如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恩格斯写信給馬克思說,由于研究历史的結果,他对于波兰問題得出了悲观的結論,认为波兰問題只有暫时的意义,即只是在俄国土地革命以前才有意义,认为波兰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只是一种“大胆的荒唐举动”。“波兰甚至单对俄国來說,也绝对不能表現什么进步或历史意义”。俄国所有的文化、教育、工业以及资产阶级成份,要比“沉眠不醒的貴族波兰”多些。“华沙与克拉科夫怎能比得上彼得堡,莫斯科和敖德薩呢!”。恩格斯不相信波兰貴族底起义能有什么成功。

可是这些具有极多英明远見的思想,却并没有妨碍恩格斯和馬克思过十二年以后,即当俄国仍在沉眠而波兰則已沸騰起来的时候,又对波兰运动表示极深切热烈的同情。

一八六四年,馬克思起草国际宣言时写信給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四日)，說必須同馬志尼底民族主义思想作斗争。他說：“当宣言內說到国际的政策时，我讲的是国家而不是民族，我所揭露的是俄国而不是比較次要的国家”。民族問題与“工人問題”比較起来，只有一种从屬意义，这在馬克思看来是无可置疑的。但他的理論与忽視民族运动的观点絕對不同。

一八六六年到来了。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中論到巴黎“蒲魯东派”，說这一派“宣布民族性为无稽之談而攻击俾斯麦与加里波的两人。这一策略当作反对沙文主义的論战手段来用，是很有益处，而且可以解釋的。可是信仰蒲魯东的人（我这里的好友拉法格和龙格，也在其內）竟认为全部欧洲都可以而且应当安分守己，坐在那里等待法国老爷們来消灭貧穷与愚昧……这难道不是可笑之至么”（一八六六年六月七日的信）。

“昨天，——馬克思在一八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写道，——在国际总委员会里討論过目前战争問題……果然不出所料，討論归結到了‘民族性’問題与我們对该問題的态度……‘少年法国’底代表（**非工人**）发表意見，說一切民族性以及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見。这是蒲魯东主义的斯底納思想……全世界都应当等候法国人成熟起来实行社会革命……我开始发言时就說，我們的朋友拉法格及其他廢除了民族特性的人，竟向我們讲法語，即是讲会場上十分之九的人都不懂得的語言。英国人听到我这一段話就哈哈大笑

起来。后来我又暗示說，拉法格大概是不自觉地把所謂否认各个民族特性了解要由模范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哩”。

从馬克思所有这些批評意見中可以得出一个很明显的結論：工人階級是最不会把民族問題当作偶像的，因为資本主义底发展不一定就喚起一切民族都来爭取独立生活。可是，既然群众的民族运动已經产生出来了，那末不理睬它，不去贊助其中所有的进步成份，这在事实上就是陷入**民族主义的**偏見，就是认为“自己的”民族是“模范民族”（或者——我們补充一句——是唯一享有建立国家的特权的民族）^①。

我們又来讲爱尔兰問題吧。

馬克思关于这个問題的主張，在他的书信里有如下几段言論表明得最为清楚：

“我正极力設法激起英国工人举行示威来援助芬尼亚运动⁴⁸……过去我以为爱尔兰脱离英国而实行分立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却认为这是必不可免的了，那怕分立以后又会要結成联邦”。——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

他在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写的一封信里又补充說：

“我們应劝**英国**工人怎样作呢？我以为他們应当在自己綱領內規定要破裂联盟”（所謂联盟是指英国与爱尔兰联

^① 还請參看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六月三日致恩格斯的信。“……我讀了泰晤士報駐巴黎記者底通信，得知巴黎人有亲波反俄的表示，真使我感觉滿意……蒲魯东先生和他那个学理主义的小团体决不能代表法国人民”。

盟，而破裂联盟就是指爱尔兰脱离英国分立)，——“簡言之，就是載明一七八三年的要求，不过要使其民主主义化而适应于现代的条件罢了。这是解放爱尔兰的唯一合法的形式，因此也就是**英国**党底綱領唯一可以采納的形式。以后的經驗一定会指明由一个人治理两国的联盟制度是否可以长久存在……

……爱尔兰人所需要的是：

(一)自治与离英独立。

(二)土地革命”……

馬克思非常重視爱尔兰問題，他关于这个問題在德意志人职工会中作过几次一点半钟的报告（参看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的信）。

恩格斯在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写的信里，指出“英国工人中間有仇恨爱尔兰人的心理”！差不多过了一年以后（一八六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他談到这个問題时又写道：

“从爱尔兰到俄国只差一步……拿爱尔兰历史为例证，就可以看到，要是有一个民族奴役了别个民族，这对于它自己該是何等不幸呵。英国一切卑鄙現象都是从爱尔兰問題中間发生的。关于克倫威尔时代，我还应当去研究，可是無論如何我认为有一点是无疑的，就是假如沒有必要在爱尔兰实行軍事式的統治和建立新的貴族，那末連英国情形也会呈出另一种局面的”。

我們还要順便指出馬克思于一八六九年八月十八日

致恩格斯的信：

“波兰工人因有他們柏林同志底帮助，在波兹南举行了胜利的罢工。这种反‘資本老爷’的斗争虽然还是低級形式，即罢工形式的斗争，但它之能鏟除民族偏見，却要比資本家老爷們高談和平的声明厉害得多”。

馬克思在国际內对爱尔兰問題所实行的政策，可从如下的事实中看出：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八日，馬克思写信給恩格斯說，他在国际总委员会內关于英国內閣对赦免爱尔兰人的态度問題讲了一点一刻钟的話，并提出了如下的決議案：

“議决如下：

格拉斯頓先生答复爱尔兰人要求釋放爱尔兰爱国分子时故意侮辱了爱尔兰民族。

他所提出实行政治大赦的条件，无论对于被恶劣政府所牺牲的人或对于这个政府所代表的人民，都是同样耻辱的；

格拉斯頓身为政府官吏，先前曾当众郑重表示欢迎过美国奴隶主底暴动，而現在却公然向爱尔兰民族宣傳消极服从的学說；

格拉斯頓先生对于赦免爱尔兰人問題的全部政策，都是他先前极力加以揭露因而推倒了敌党(保守党)內閣的那种‘**侵略政策**’底十足表現；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对爱尔兰人民勇敢坚决而高尚地要求大赦的运动表示欽佩；

本決議案應通知國際工人協會一切支部及歐美各國所有一切與它有聯系的工人團體”。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日，馬克思寫道，他預備要在國際總委員會內對於愛爾蘭問題作一個報告，其內容將如下述：

“英國工人階級底直接的絕對的利益，是要它斷絕現在與愛爾蘭的關係而完全與所謂‘替愛爾蘭主持公道’的各種‘國際主義的’和‘人道主義的’詞句無關，因為‘替愛爾蘭主持公道’這點在國際總委員會內是不言而喻的。這是我的極深刻的信念，而這種信念所根據的理由有一部分我是不能向英國工人說明的。我在許久時期內都會認為可能借英國工人階級運動底高漲來推倒統治愛爾蘭的制度；我在紐約論壇（這是美國報紙，馬克思在很長一個時期向該報投過稿）上始終都擁護過這種觀點。但是我更深刻地研究了這個問題以後，卻得出了相反的信念。英國工人階級在未卸脫愛爾蘭以前，便一點也沒有辦法……英國內部的英吉利反動勢力，是以奴役愛爾蘭為其根源的”（着重點是馬克思自己加的）。

馬克思在愛爾蘭問題上的政策，讀者現在想必已完全明白了吧。

“空想的”馬克思竟是如此“不合求實精神”，公然主張愛爾蘭分立，而這種分立却在五十年後也還沒有實現。馬克思為什麼採取這個政策呢？這個政策是不是個錯誤呢？

馬克思起初以为能解放爱尔兰的不是被压迫民族中的民族运动，而是压迫民族中的工人运动。馬克思并不把民族运动看做有绝对意义的东西，明知只有工人阶级底胜利才能使一切民族得到完全的解放。各被压迫民族中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与压迫民族中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間各种可能的相互关系（这正是现代俄国民族問題极其困难的地方），是无法预先察知的。

但后来情形改变了：英国工人阶级在頗长一个时期內陷于自由派影响下，成了他們的尾巴，因实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而割掉了自己的头脑。爱尔兰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加强起来而采取了革命的形式。于是馬克思就把自己的观点重新审查而加以糾正。“要是有一个民族奴役了別个民族，这对于它自己是不幸的”。当爱尔兰尚未摆脱英国压迫以前，英国工人阶级是得不到解放的。英国反动势力靠奴役爱尔兰来巩固和取得营养（也如俄国反动势力靠俄国奴役許多民族来取得营养一样！）。

馬克思在国际中提出了对“爱尔兰民族”，对“爱尔兰人民”表示同情的決議（聪明的 Л. Вл. 大概要大罵可怜的馬克思忘記阶级斗争了！），鼓吹爱尔兰应脱离英国而**分立**，“那怕分立以后又会要結成联邦”。

馬克思这一結論底理論前提是什么呢？资产阶级革命在英国一般是早已完結了。但它在爱尔兰却还没有完結；只是現在，經過五十年以后，英国自由派的改良才把

它完結起来。如果英国資本主义的顛复，有如馬克思最初所預料的那樣快，那末爱尔兰就不会有全民資產階級民主运动了。可是这种运动既然产生出来了，馬克思就号召英国工人去贊助它，給它以革命的推动，为了本身自由而把它进行到底。

爱尔兰与英国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經濟联系，当然要比現在俄国与波兰及烏克蘭等等的联系更为密切。当时，爱尔兰脱离英国分立的“不合求实精神”与“不可实现性”（单就地理上的条件，以及英国护有极大的殖民地勢力來說），是显而易見的。馬克思虽是个原則上反对联邦主义的人，但他这次却也容許联邦制^①，只要爱尔兰的解放不是由改良的道路而是由革命的道路，即由英国工人階級所贊助的爱尔兰民众运动来达到就行了。毫无疑义，只有这样来解决历史任务，才是最能适应无产阶级利益和促进社会迅速发展的。

結果竟不是如此，原来爱尔兰人民与英国无产阶级都軟弱无力。直到現在，才由英国自由派与爱尔兰資產階級实行一种可怜的妥协分贓办法，用土地改良（必須繳

^① 順便說說：不难了解，为什么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看来，既不能把民族“自决”权解釋为联邦制，也不能解釋为自治（虽然抽象地說来，两者都是包括在“自决”这个概念內的）。联邦权根本没有什么意思，因为联邦制乃是双方的契約。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在自己的政綱內一般地拥护联邦主义，这是无待說明的。至于自治呢，那末馬克思主义者所拥护的并不是自治“权”，而是自治**本身**，作为具有复杂民族成份以及极不相同的地理等等条件的那种民主国家底一般普通原則。因此，承认“民族自治权”，也如承认“民族联邦权”一样，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付贖金的改良)和自治(現時還沒有施行的自治)来解决着爱尔兰問題(阿尔斯特底实例,表明这是很难于办到的)。究竟怎样呢?能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馬克思与恩格斯是“空想家”,說他們提出过“不可實現的”民族要求,說他們受了爱尔兰小資产階級民族主义者(芬尼亚运动无疑是小資产階級性的运动)底影响等等呢?

当然不能。馬克思与恩格斯在爱尔兰問題上也实行了真正以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群众的一貫无产階級政策。当时只有这个政策才能使爱尔兰和英国都不致把必要的改革迟延五十年,不致让自由派为取悅于反动势力而把这种改革弄得殘缺不完。

馬克思与恩格斯在爱尔兰問題上的政策是至今还有极大**实际**意义的偉大榜样,表明各压迫民族中的无产階級应当怎样对待民族运动,叫人認識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入种和各个民族中那些奴僕成性的市僧,他們一看見有人实行改变某一民族地主資产階級底暴力和特权所造成的国界,就馬上宣布說这是一种“空想”。

假如当时爱尔兰无产階級和英国无产階級沒有采納过馬克思底政策,沒有提出过主張爱尔兰分立的口号,那他們就会不免要作出最有害的机会主义錯誤,就会是忘記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底任务而向**英国**反动势力和資产階級让步了。

写于一九一四年二月。

論歐洲聯邦口號

我們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四十期上曾通知說，我們的国外支部代表會議決定把“歐洲聯邦”口號問題暫時保留，等到在刊物上討論這個問題底經濟方面時再講。

我們的代表會議對於本問題的討論帶有片面政治的性质。這也許有幾分是因為在中央宣言上把這個口號直接提作政治的口號（宣言上說：“最近政治口號……”），而且那里不但是主張共和制的歐洲聯邦，同時還特別着重指出，“若不用革命手段推翻德奧俄三國君主制度”，則這個口號便會是毫無意思和虛偽的。

在對這個口號作政治估計的範圍內來反對這樣的問題提法，譬如說，以為這個口號能蒙蔽或削弱社會主義革命口號等等，那是完全不對的。真正民主的政治改造，尤其是政治革命，無論何時，無論在何種情形與何種條件下，都是不能蒙蔽或削弱社會主義革命口號的。恰巧相反，它們總是促進社會主義革命，替它開展基礎，吸引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群眾中的新階層來參加社會主義鬥爭。另一方面，政治革命在社會主義革命底過程中是必不可免的，因為決不能把社會主義革命看作是一舉而

成的事业，而要把它看作包括有許多政治上經濟上的大震动，极紧张的阶级斗争，国内战争，革命及反革命的整个时代。

固然，以用革命手段推翻欧洲三个最反动君主制度（特别是俄国君主制度）为条件，把共和制的欧洲联邦这一口号提作政治口号，是完全无可非难的，但是还剩下有一个关于这口号底经济内容与意义的最重要的问题。从帝国主义底经济条件方面看来，即是由那些占有殖民地的“先进”“文明”强国输出资本和瓜分世界的事实方面看来，欧洲联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若不是无法实现，便是反动的。

资本已成为国际的和垄断性的了。世界已被极少数的强大国家，即是在大规模抢掠和压迫其他民族的事业中获得成功的强国所瓜分了。欧洲四大强国，即英法俄德四国，共有二万五千万至三万万的人口以及约近七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而它们所占领的殖民地却有约近五万万（四万九千四百五十万）的人口和六千四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即是差不多占全地球面积之半（全地球面积除两极区域外，共有一万三千三百万平方公里）。此外还有亚洲三个国家，即中国，土耳其，波斯，现在被日俄英法这四个进行所谓“解放”战争的强盗弄得四分五裂。可以叫做半殖民地的（其实现在十分之九已成了殖民地的）这三个亚洲国家，共有人口三万六千万，面积一千四

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即差不多等于全欧洲面积一倍半)。

再則，英法德三国在国外的投資不下七百万万卢布。为要从这笔令人快意的款項上得到“正当的”收入，每年三十万万卢布以上的收入，就有巨万富翁們底全国委员会，即所謂政府为之服务，这些政府掌握有海陆军队，而把“巨万富翁”底子弟“安置”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充当什么总督，領事，大使，各种官員，牧师以及諸如此类的吸血虫。

在資本主义最高发展的时代，少数巨大强国搶掠地球上将近十万万人口的事情，就是这样組織起来的。而且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根本就不能有另一样的組織。放弃殖民地，放弃“势力范围”，放弃輸出資本么？誰这样想，誰就是墮落到傳教师的地步，他每逢星期日都向富翁宣讲基督教寬大为怀，劝他們施济貧民……当然不是拿出几十万万卢布，而是每年拿出几百卢布就行了。

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成立欧洲联邦，就等于成立瓜分殖民地的协定。可是在資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实力之外，便不能有別一种实行瓜分的基础和原則。这些巨万富翁无论与其他什么人瓜分資本主义国家底“国民收入”时，除了“按資本标准”以外，是不能有其他什么标准的（而且还要附加一点：务使巨大的資本得到比它所应得的更多）。資本主义就是生产資料的私有制和无政府性的生产。在这种基础上鼓吹“公平”分配收入，便是蒲魯东主

义，便是市僧和庸俗人底痴想。瓜分是只能“按实力标准”来实行的。而实力又是随着经济发展进程而变动的。一八七一年以后，德国的加强，要比英法两国快三四倍；日本要比俄国快十来倍。要測驗资本主义国家底真正实力，除了战争之外，便没有而且也不能有什么别的办法。战争并不与私有制基础相抵触，而是这些基础底直接和必然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经济单位和各个国家在经济上的平衡发展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工业中的危机和政治中的战争而外，便不能有别的什么办法来恢复常被破坏的均势。

当然，各个资本家间与各个强国间的暂时妥协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建立欧洲联邦，作为欧洲资本家相互间的妥协也是可能的……关于什么问题的妥协呢？不过是关于怎样共同镇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共同保卫所抢得的殖民地，反对日本和美国，因为这两个国家在现今的殖民地分配情形下是极端受屈的，而它们的势力在最近五十年来加强的速度又要比那因年老而开始腐朽起来的落后的，君主制的欧洲快得无可测量。整个欧洲，与美国比较起来，可说是在经济上停滞着。在现今的经济基础上，即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欧洲联邦，就会是组织反动势力去阻碍美国更迅速的发展。民主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只是与欧洲相连的那种时期，已经是一去不返了。

世界联邦(而不是欧洲联邦)就是我们认为是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联合和自由发展的国家形式,直到共产主义底完全胜利使一切国家,以至民主制的国家都完全消灭的时候为止。但是,把世界联邦口号作为独立口号,是未必正确的,因为第一,它与社会主义混合起来了;第二,它能产生一种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不正确的见解,以及对于这个获得胜利的国家与其余各国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的不正确的见解。

经济上政治上发展的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底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且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内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各国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武装起义来反对资本家,遇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无产阶级在其中推翻资产阶级而获得了胜利的那个社会底政治形式将是民主共和国,它日益集中这一民族或这些民族里的无产阶级力量去反对还没有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国家。没有无产阶级这一被压迫阶级底专政,便不能消灭阶级。若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所进行的较为长期的坚持斗争,便无法保证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自由联合起来。

正是由于这些理由,所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

支部代表會議上以及在會議以後再三討論了這個問題的結果，中央機關報編輯部便得出了結論，認為歐洲聯邦口號是不正確的。

寫於一九一五年八月。